

##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笔谈)

**编者按:**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当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叙述?藉2019年8月举办“首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之机,本刊特邀6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理论思考,围绕“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这一话题予以深入研讨。本组笔谈即是此次座谈会的部分成果。

**关键词:**中古史;学术史;历史场景;经典图式;民族史;货币史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6.06

### 走向历史场景

魏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自陈寅恪先生以来,中国中古史(一般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积累,名家辈出,成果不可谓不丰厚。但如果对照欧美世界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无论是议题的丰富性,还是成果的多元化,又显得颇为单薄。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研究者苦心孤诣,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这大概就是“重绘”的意涵。然而如何“重绘”,可能性在哪里,却是见仁见智,意见未必(亦不必)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入思考,这里只能就个人近年来的学术工作,略谈感想。

最近十余年,我花费比较多的精力观察和探讨3至6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主要是具体的山岳个案研究,先后关注过十余个地点,最近集结为一本小书出版<sup>①</sup>。学术新意自不足道。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主要是考察某座具体山岳的文化景观和空间,分析相关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其意义,就不得不进入相对微观的层面,经常做一些琐碎的小地点考证。小地点上的史料往往比较缺乏,为了拓展论证空间,不得不经常实地考察,徜徉于沧海桑田的地理环境和往往一无所存的六朝遗址中,依稀想象过去。古今印证,山川有情,唏嘘之余,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动的时刻。

这时候就经常会想: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 我们,投入人生最多的精力于此遥远之过去?在最感性的层面上,可能还是往昔那些富有魅力的细

<sup>①</sup> 魏斌:《“山中”的六朝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节场景。山林往事大都不见于正史,需要借助于更加地方性的史料勾陈索隐,浮现场景。就我自己的研究体验来说,无论是在庐山宫亭庙中发生的种种神异传说,还是《真诰》中呈现的茅山信仰舞台,或是《善慧大士录》记录的乌伤县稽亭村激烈的宗教实践,那些生活在六朝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喜和悲,尊严和挫折,都呈现为一幕幕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仿佛鲜活于目前。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之中。秩序和观念塑造着每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又通过不断延展的关系互动网络,支持和延续着原来的秩序和观念,成为一个不断相互再生产的过程。内在的演化、断裂,或者外来的冲击,会让这个再生产过程产生变异甚至震荡,或者表现为复杂化,或者表现为简单化;具体的形态,则依存于彼时人与事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几乎所有的这些过程,原本都呈现为一幕幕鲜活的场景,有的场景是日常性的,重复而沉闷,有些是突发性的,更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感。从史料中爬梳发掘这些场景,描绘和构建有意义的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和情境——比如权力秩序、信仰形态、文化模式,以及形成这种结构和情境的关系互动网络,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于其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生命状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研究路径。

极端一点说,人的几乎所有行为,包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之类,都是秩序和观念塑造的文化现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往昔发生过的几乎所有历史场景也都隐含着深远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关键性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普通人和他们经历的日常性的琐碎,也都可以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入口。

不过,往昔场景虽然无穷,史料却是有限。一般而言,研究的历史时段愈早,可供利用的史料愈少。像《蒙塔尤》那样细节充盈的村落史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实在是可羨而不可得。由于史料残缺的限制,某个历史场景能否有足够的细节支撑,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对象(对于现代学术体制下的研究者而言,更直接、更功利的指向,是能否写成具有一定篇幅的论著),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反复咀嚼那些人所熟知的史料,一方面也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或者那些原本不那么受人重视的“边缘性”旧史料。这两条路径同等重要。不同研究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喜新,或爱旧。但新旧不过相对而言,对于传世文献有限、出土资料总量亦不乐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而言,往昔保存下来的痕迹本已不多,一切弥足珍贵,皆是理解过去的媒介,无须厚此薄彼。难点主要在于处理有限的残缺史料的能力,这需要敏锐的感觉、细腻的分析 and 论证技巧,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侦探破案,推理需要“细密”<sup>①</sup>,构想要有“巧思”<sup>②</sup>,还要有恰当的分寸感。处理这些限制的能力之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水准,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技术”特点之一。

在有限的残缺史料中发现和构建往昔画面,让人想到电影导演通过镜头讲述故事。电影镜头之前,最基本的元素是一幕幕事先设计好的场景,通过演绎、拍摄和剪辑、拼合,最终呈现为连缀画面而成的叙事。而好的导演,也往往会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性认识,特别是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这种思考方式,与历史学者颇为类似。只是相比起来,历史学者无法自己主动设计场景,同时也受制于残缺不全的史料,只能“带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诗

① “细密”,是胡宝国先生总结田余庆先生的学术特点之一,他说:“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便不得不细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很辛苦的工作。”(《以学术研究为宗教》,《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

② 这是田余庆先生在《缅怀唐长孺先生》(《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6日)中特别提到的一点。他特别提到的是唐先生《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一文,说“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题,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田先生对“巧思”特别强调,在这段缅怀文字中,他还又举出了傅斯年《周东封与殷移民》以及陈寅恪当选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时英方举出的三篇代表作《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作为例子,并说“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这其实也是田先生自己的追求。胡宝国先生在评论《东晋门阀政治》时就说:“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读〈东晋门阀政治〉》,《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我想,在上古史、中古史领域更强调“巧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解读有限的残缺史料,更需要推理技巧和想象力。

的格律》),从仅存的只言片语甚或考古遗存中发现场景,描绘画面,构建过去。虽然无法像电影导演一样自由驰骋想象力,但仍然也是希望将自己觉得感动而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文字的画面中了解往事,体验历史美感,反思过去的权力秩序和文化传统。

举一个《北齐书》中的场景为例。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欢率大军围攻玉壁城数月不下,最终因病回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sup>①</sup>男儿和歌,英雄涕泪,无疑是一幕让人感动的场景。而如果暂且从这种豪壮哀感的情绪中离开,从历史学的理性角度观察,这幕场景其实包含着很多理解当时历史的线索。一个最基本的提问就是:为何在高欢去世之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场景?当然可以说,这只是高欢本人的偶然行为。可是如果联系到东魏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秩序,就会发现这个场景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情境。

高欢特意要接见的“诸贵”,简单地说,是围绕在他身边以血缘、地缘等要素联结起来的勋贵集团。他们主要来自六镇边境,很多都是鲜卑军人或敕勒酋长,掌握着高欢集团的主要军事力量。“诸贵”和高欢有着相似的早年社会化过程,熟悉的是游牧、农耕混合地带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他们来说,鲜卑语和敕勒语代表着草原,也代表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北齐书·高昂传》曾说:“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sup>②</sup>高欢去世前的哀感场景,强调的文化符号是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之,用的自然也是鲜卑语或敕勒语。这固然是暮年伤感,一时情绪,怀念当年六镇边境的生活,但同时也是在传达着文化认同的信号。换言之,这个场景看起来像是随意的行为,其实蕴含着政治习惯、权力关系、草原语言与文化认同等多种历史要素。这些在现在的学术分科中分属于政治史、民族史、语言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但当时则是汇聚在这幕感人的场景之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瞬间。

如何通过这个“画面”观察和分析当时的历史?或许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分析高欢接见的“诸贵”,具体包括了哪些人?在东魏政治集团中,这些人究竟具有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如何当时的制度体系和政治习惯中运作?其次,“诸贵”们主要是鲜卑(或者鲜卑化的)人,通用语言也是鲜卑语,但出场的为何是敕勒歌,而不是鲜卑歌?鲜卑和敕勒两种人群及其文化认同,在北境社会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第一个层面的讨论,以往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方法则是人所熟知的集团分析。东魏最核心的“诸贵”群体,主要来自怀朔镇,如果化用谷川道雄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或可概括为“怀朔镇军阀的形成”。至于这些勋贵群体内部的关系建构和权力分配,却又不仅仅是传统政治史,还涉及到民族史问题。草原边境的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习惯,是否会影响到这一集团的组织方式?这种内亚视角的提问,也很值得注意。第二个层面,以往基本属于民族语言学和俗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主要关注和分析的材料,则是《乐府诗集》卷八六收录的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实际上这一层面的学术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只是因为涉及材料极少的北族语言和文化,研究难度很大。

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幕场景背后的结构和情境,但以往很少结合起来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现代学术分科之弊。在此多说一句,学术分科,或者更具体一点儿说,历史学内部各门类的区分,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一方面强化了某种更为专业性的视角,使得相关研究更加专门深入;一方面也往往带来相当程度上的自我封闭,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野。“我是做政治史的”“他是做宗教史的”——在类似的边界设定下,研究者会习惯于仅仅是在边界以内分析问题。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多元而复杂,往往同时呈现多种“专门史”的内容,很难画牢自限。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有了新的感悟:

① 《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3页。

② 《北齐书》卷二《高昂传》,第295页。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果只是一首草原上的普通民歌，是很难有机会被转译、收入华夏书写系统的，——一定需要某种契机。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敕勒歌》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六镇之乱后边境人群的内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文化混融过程。《北齐书》中的场景就发生在这种情境下。《乐府诗集》卷八六引《乐府广题》，特别提到了这个场景，并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sup>①</sup>。《敕勒歌》来自草原边境，但在这个场景中，歌者斛律金、听众高欢和“诸贵”，却都是已经离开了草原边境的人。《敕勒歌》的唱和，作为一种仪式和文化再现，唤起的一方面是他们对草原边境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内迁“鲜卑车马客”在文化的异乡所产生的漂泊沧桑之感。而在六镇边境，鲜卑或鲜卑化的镇民，敕勒酋长和部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后者“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sup>②</sup>，更具有草原特征，《敕勒歌》或许因此成为代表性文化符号。

这样承载着丰富文化意蕴的场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在上演。这些是历史中最令人感动的音符。对于我自己而言，最希望去做的，就是试图捕捉住这一幕幕的场景性瞬间，透过画面理解他们在结构和情境中的生命感。他们如果是普通人，那就践行“眼光向下的革命”；更有可能是大人物，那么就“重回帝王将相”。近年来的史学潮流，强调要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但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未必一定先进，研究帝王将相也未必意味着落伍和陈旧，刻意区分二者，不过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而且由于史料遗存的不均衡，也使得往昔最精彩的“日常”往往集中于社会上层，普通人的历史很少被记入文献，不易寻觅。实际上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所经历的场景是否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历史瞬间，而相关的细节史料又是否能够支撑起分析和论证，只有如此才可能真切刻画历史中的生命与尊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最根本的是如何理解生活在往昔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他们在喜怒悲欢中创造的历史过程。任何口号性的学术潮流和方法，不过都是方便一阐提人成佛的易行法门，研究者对此需要抱有足够的警惕。

文章开始提到，中国中古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和分析话语传承有序，蔚然可观。对于后学者来说，这一点既是幸事，又是烦恼。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之一，是草创期的问题意识和概念，往往会在理论意义上被继承和经典化，本来的意义在学术演化中逐渐被遗忘，有时候甚至会更进一步，彻底演化为概念游戏，在职业生存和刻意求新的口号驱动下，无意识地生产着可能连研究者自己也觉得模式化、琐碎而平庸的专业论著。当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术困境，以我的粗疏，当然不敢妄下判断。仅就个人的研究体会来说，尽可能破除刻板印象和模式化的分析话语，走向原本多元、生动的历史场景，在总体的文化关照下刻画、呈现和分析场景背后所承载的秩序和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思考未来，也许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

中古史研究只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隅。侯旭东先生在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到：“走出西方生产/中国消费、社会科学生产/史学消费的格局，仅凭愿望无法实现，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对于中国历史学面临的迫切问题，即如何走出模仿西方，走出理论生发能力的贫乏状态，他给出的建议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具体而言，则是“反思既有的提问方式与使用的概念，真切地立足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经历，发现内在于过往生活实际的问题，归纳现象，提炼概念，构筑解释，在与古人、今人的反复对话中构建史学认识”<sup>③</sup>。笔者在近年的学术实践中也常有此感触，汉语学术的自立和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生长，需要踏踏

①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六《杂歌谣辞四·敕勒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12页。

②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9页。

③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10页。

实实在在地回归对往昔人群和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从中构建新识。时间如流水永在流逝,社会情势和文化语境不断变化,生长经历于其中的历史研究者,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关怀之点;立足今日,观察历史,提问方式和意旨亦当随之而变化。唯其如此,学术方能不断焕发新意。

## 搁置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

孙正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

单看表面景象,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繁荣甚至可以说是大爆发的时期。翻看《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年度回顾,每年数以千计的论文发表,多达数百部的论著刊出,包括讲座、会议、研学、考察乃至夏令营在内的各类学术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不见间歇。不过,这幕由数字搭建的繁荣,其实质又如何呢?李华瑞曾统计近五十年的宋史研究状况,指出在多达 1.5 万篇的研究论著中,有 1/3—1/2 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sup>①</sup>;李伯重也坦陈国内学术著作中大多数作品是平庸之作<sup>②</sup>。葛兆光不止一次说到,当下 90% 的书可出可不出,学术杂志上 90% 的文章可看可不看。几位先生没有专门论及中古史研究,但后者大约不能例外,每年数以百计的研究成果中不少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研究属低水平简单重复,缺乏开拓创新,借用仇鹿鸣批评当前士族研究时所说,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学术“内卷化”倾向<sup>③</sup>。

走出学术内卷化,需要突破的自然有许多,首当其冲的毋宁说是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自 20 世纪初现代历史学在中国建立以来,中古史研究也与时俱进,获得长足进展,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建立了不少超越微观研究、把握中古历史演变理解图式,这也是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水准较高的原因之一。这些历史理解图式,既包括在历史分期大讨论背景下衍生和成熟的对中古史的宏观认识,如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发扬光大的中古贵族制论,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的魏晋封建论;也包括围绕中古特定历史问题展开的中层理论概括,譬如中古政治文化的汉化、胡化说,陈寅恪提出的隋唐制度三渊源说、北周隋唐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说,唐长孺首倡的南朝化理论,田余庆、阎步克主张的北朝主流论或北朝出口论等;此外还包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譬如集团分析法,不论是依据地域、文化形成的集团,还是凭借种族、阶级形成的集团,都被视为理解复杂政治的“钥匙”,用以阐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这些经典图式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抽绎、提炼而来,化繁为简,极大地便利了后世学人认识这段历史。

不过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积累,这些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却意外地正成为新研究的“绊脚石”。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些经典图式有多少“原罪”,更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些学者对于它们的率尔甚至过度使用,一些具体问题被太过轻易地与经典图式关联,进而在后者的框架下进行解释。譬如中古贵族制或士族理论,虽然不无争议,甚至在日本学界曾引发长时间论战,但不得不说迄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古史研究中影响巨大。于是一些学者面对具体问题时,不论其事实上是否与贵族制或士族理论相关,便不假思索地将二者进行关联。论及皇权低落,便是贵族政治;论

<sup>①</sup> 李华瑞在教育部社政司与杭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学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6月),转引自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sup>②</sup> 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sup>③</sup> 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及土地侵占,便是贵族经济;论及重文轻武,便是贵族文化;论及宫廷辞赋,便是贵族文学,——仿佛彼时一切问题都与贵族制密不可分,都是作为政治形态的贵族制的外在表现。而由此衍生的唐宋变革论,同样也被视为理解唐宋历史变迁的关键,其使用之广,学界甚至有“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的戏言。又集团分析法,自陈寅恪首倡这一研究“利器”后,迄今仍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大行其道<sup>①</sup>。一些学者在处理中古政治问题时,也习惯于依据地域、文化、种族、阶级等划分集团,进而通过集团斗争、权力升降来把握政局演进或政治文化的嬗变。汉化、胡化说亦是如此,一旦涉及族群问题,它们常常是首先被联想起的标签,轻易被安插在各个与族群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在这些研究中,经典图式不仅构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还常常被视为“万能钥匙”,用来开启中古时期或大或小的各类问题之锁。这样的研究不仅有以论代史的嫌疑,更糟糕的是,原本具有启发意义的经典图式事实上正变成一种束缚,钳制了学者的发散思维,阻止学者从其他可能的视角去思考中古历史。其结果便是,在这些经典图式基础上成立的新研究,绝大多数只是印证经典图式早已揭示的结论,并不能提供多少新知。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说,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并不意外。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亦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应地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知觉是由感觉察觉的现实刺激和已贮存的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过去的知识经验参与知觉的方式,在持知觉的假设考验说的学者看来,主要是以假设、期望或图式的形式在知觉中起作用,即人在知觉时,接受感觉输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或者激活一定的知识单元而形成对某种客体的期望<sup>②</sup>。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识,势必既受个人先天倾向同时也受个人原先所获知识的影响,即受到个体知识结构的限制<sup>③</sup>。概言之,即所知引导所见。明乎此,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所知引导所见虽然容易发生,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思维惰性,如果能够克服这种思维惰性,或许别有洞天。对于唐代中后期的唐廷与藩镇、宦官与朝臣之争,如果只是简单采取集团分析的方式,呈现的或只是权力争夺、暴力对抗,而诸如制度化的皇帝权威与合法性的历史意义、唐廷与藩镇的合作与共谋等诸多丰富真实的历史面相则被遮掩<sup>④</sup>;同样对于汉末以至魏晋的政局演进,如果遵循集团分析法,看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不同出身、地域或文化的政治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和地位升降,历史现场更为复杂多歧的政治生态则不免受到忽视<sup>⑤</sup>。

贵族制或士族理论亦是如此。一些看似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问题,事实上可能存在另外的解释方向,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很好的示范。譬如对于九品中正制,一般认为这是贵族制的重要支撑,是保障贵族权力的制度基础<sup>⑥</sup>,唐长孺却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九品中正制后来服务于门阀士族,但在制度建立伊始,却是以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为初衷的<sup>⑦</sup>。又如依据统计,截至李唐灭亡或黄巢之乱前,士族出身者仍是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在进士科第中亦占据优势,故不少学者认为直至晚唐,仍属中古

① 关于集团分析法的影响及反思,参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9—220页。

② 王甦、汪圣安:《认知心理学》(重排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5页。

③ 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修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④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⑤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中古史,在其他断代史中,也可看到超越集团分析法的努力。参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⑥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即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⑦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1—121页。

士族社会<sup>①</sup>。不过按照陈寅恪和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意见,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僚乃是凭借进士文词而非门第跻身统治阶层,这与士族社会内门第决定仕途显有不同<sup>②</sup>;陆扬则意识到唐后期政治文化精英中酝酿出了另一种无关门第的文化认同——清流文化,并延续至五代及宋初,这一矛头对准唐宋变革论的认识,无疑也是对晚唐贵族社会说的消解<sup>③</sup>。此外,被视为中古贵族制论证据的诸多事实,田余庆通过对东晋政治史的缜密分析,确认所谓门阀政治实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sup>④</sup>。

笔者自己的研究中也曾触及类似问题。譬如东晋南朝有东西省,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固定行政职事的散官,多由官贵子弟起家出任,至陈朝时还形成明文规定。这样一种官制形式,很自然会被认为是贵族制的体现,毕竟与之类似、保障官贵子弟仕途的九品中正制就被视为贵族制的重要支撑之一。不过,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荫子之制在中古以前的汉代业已出现,宋代以降也仍存在,甚至在被认为是君主高度集权的辽金元清等非华夏族群主导的政权,类似制度也依然不绝。明乎此,对于东西省与贵族制的关联,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理解了。事实上,东西省密迩殿省,与皇帝存在超越官僚制的私人亲近关系,故东西省不仅不是贵族制的支撑,相反却具有维系、伸张皇权的潜在机能。轻易将其与贵族制关联,即便成立,对于理解中古政治社会也无甚裨益,而彼时政治社会的其他一些面相却因此或被遮掩<sup>⑤</sup>。

又六朝皇帝效仿、学习士大夫,乘坐牛车,着白纱帽与进贤冠。考虑到贵族制论下贵族的强大影响力,因此这也很容易被理解为贵族制的产物。不过仔细追究,会发现皇帝乘坐牛车及着白纱帽、进贤冠,均出自皇帝自主选择,并未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这就犹如唐代皇帝喜着幞头,爱好骑马,同样与权力因素无关。类似的表现其他历史时期也存在,譬如清朝雍正、乾隆二帝喜欢将自己装扮成文士的形象<sup>⑥</sup>;南薰殿藏宋代皇帝画像所见宋代皇帝也未穿着彰显帝王威严的冕冠、通天冠,而是选择了与一般官僚没有什么差别的展脚幞头。要之,皇帝的舆服风尚大多只是个人喜好所致,与政治权力、社会形态无关,强行将之置于某个社会结构下予以解释,结果只能南辕北辙,适得其反<sup>⑦</sup>。

所谓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均是在经历长时间的研究积淀、大浪淘沙之后被后世学人认可、接受并被奉为经典的,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而经典图式处理的都是中等层次以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涵括性,其能辐射多数问题也不难理解。不过,经典图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不是所有具体问题都能在经典图式中找到合适位置。一味套用经典图式,只会束缚自己的思维,引导思考向经典图式靠拢,阻止自己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问题,其结果只能导致研究无论证成还是证否经典图式,都只是在经典图式内打转,跳不出经典图式的“五指山”。事实上,如果深陷经典图式,一些问题甚至无法被发现,更遑论解决<sup>⑧</sup>。在此状况下,试图提出新知,无异于天方夜谭。

进言之,经典图式不是历史事实,具有唯一性;也不是定律或真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经典图式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思考之下产生的一种历史理解方式,其既会受到学人认知水平的

① 代表性研究如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1—352页;毛汉光:《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53、334—364页等。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9—294页;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80页。

③ 陆扬:《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213—263页。

④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 孙正军:《东晋南朝的东西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5—144页。

⑥ 巫鸿:《清帝的假面舞会:雍正和乾隆的“变装肖像”》,梅玫译,《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7—379页。

⑦ 孙正军:《制造土人皇帝——牛车、白纱帽与进贤冠》,《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4—287页;修订后收入《切德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6—155页。

⑧ 胡宝国提到田余庆在对门阀政治的研究中关注流民问题、皇权作用,即有赖突破前人研究思路的限制,见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限制,也会受到时代状况的影响——贵族制论、魏晋封建论自不必说,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说、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解释安史之乱及乱后河北割据所指称的“河北的胡化”,学者也疑心与其所处时代不无关系<sup>①</sup>。而随着研究积累和时代变化,经典图式需要重新检讨是必然的。事实上,对于一些或被奉为常识的经典图式,学者已有不少反思。集团分析法已如前说<sup>②</sup>;对于所谓北人南迁与六朝江南开发及民族大迁徙等问题,罗新发起质疑<sup>③</sup>;围绕汉武帝晚年政策更辙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源自西晋司马越与王衍之联合的论断,辛德勇和侯旭东提出挑战<sup>④</sup>;又唐后期墓葬缩小、随葬品简陋,一般将其归结于中晚唐政局动荡、经济衰落,齐东方则认为其实乃是丧葬中丧、祭地位提升的结果<sup>⑤</sup>;近百年俨然成为通论的隋唐佛教宗派模式叙述,近年来学者的冲击更是前赴后继<sup>⑥</sup>;此外对于将魏晋时期碑禁与薄葬相关联的习见认识,最近徐冲也尝试提出新解<sup>⑦</sup>。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兹不赘举。尽管上述反思未必都能推翻经典图式,但这样的努力无疑值得鼓励<sup>⑧</sup>。这也提示我们,经典图式不是无远弗届的宇宙真理,并非任何具体问题都能在其羽翼庇护之下获得合理解释。面对既是宝贵遗产又可能构成思维束缚的经典图式,学者不妨做做抵抗者和反叛者,多一些批判,多一些怀疑,保持警惕,保持距离<sup>⑨</sup>,唯其如此,才能克服思维惰性,摆脱对经典图式的路径依赖,引导自己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追问,从而摆脱平庸,走出内卷,在积累已丰的中古史研究中挖掘新知。

读过《倚天屠龙记》的人大约都记得,张三丰在大敌当前之际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招式,众人苦恼于张无忌无法记住,张三丰则说招式忘得越多越好,全忘了也就练成了。历史研究,固然不能也不必完全舍弃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但至少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妨先把经典图式搁置一边,寻求在问题自身的理路内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既有知识的限制,一点一点地获得关于具体问题的新知;在此基础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重绘中古史的愿景或可实现。

## 重绘何为:反观于自身的学术史

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近代以降,随着公元纪年的引入,每逢整数年瞻前顾后、盘点学术渐成一项新的传统,近两年欣逢多个重要的整数年份,普天同庆之余,也给学人提供了反思自省的机会。“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设问陈义甚高,暗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雄心。只是当下研究者多仅在某一专门领域中有所专精,

① 孟彦弘:《木屑下的河流——谈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9月21日。

② 除前引仇鹿鸣文外,侯旭东也曾质疑其有效性。参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

③ 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走出民族主义史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8-9、75-78页。

④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侯旭东:《告别线性历史观》,《宠:信一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代序”第2-5页。

⑤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制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较近讨论参孙英刚:《夸大的历史图景:宗派模式(Sectarian model)与西方隋唐佛教史书写》,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61-373页。

⑦ 徐冲:《“碑禁”与魏晋时代的石碑文化》,“‘文’与‘物’的生成:多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9年5月。

⑧ 关于挑战经典图式的困难,美国学者 Christian K. Wedemeyer 曾有形象描述,参沈卫荣:《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⑨ 罗新:《历史学家的美德》《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第1-5、7-11页。

甚至对同一断代的其他研究,能扮演亦不过是非专业的“专业”读者之角色。因此,若要做到高屋建瓴、鸟瞰全局,实强人所难,仅谈自己熟悉的领域,即使能避免王婆卖瓜,亦恐难逃“只见树木”。

既然谈及“重绘”,我想首先需要理解已有的面貌是什么。或因晚清民国的学者与学术隐微接引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史”,自1980年代以来蔚成显学;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规范的日趋严密,研究综述已成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必备要件,遭逢整数年也会发表不少以清理某一断代或专题的学术史为目标的论著。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对晚清民国以降学术传统的流变还是某一具体研究的得失,我们都已有相当明晰的了解。但这两类讨论,前者是取法于上,或隐或显地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旨归,后者则多属知识性的清理,工具性较强,似仍较少谈及“得乎其中”的一面,即如何批判性地理解学者本身从属的断代、专业及研究门类的形成与演变。

时间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但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则是近代史学的产物。笔谈以中古为断限,不过“中古”一词本身便语义暧昧,这一研究时段正式的名称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稍显繁冗。中古本是学界的俗称,近年随着各种以“中古”为名的研究集刊大量出版,变得有约定俗成的意味,但翻检任一以“中古”为题的刊物,刊载论文多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大都无明确限断<sup>①</sup>。事实上,对于多数学人而言,使用“中古”一词本身只是为了行用之便,背后并没有明确的“时代分期”指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古史”能将传统史学中代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与象征盛世的唐代划为同一个研究单元,本身便是时代分期论的产物。“中古”绝不是指自然时间上的“中间”,而是在各种进步主义史观指引下,所勾勒的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形态演变的中间环节<sup>②</sup>。

同样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尽管在研究时段上是古代居前、近代在后,但学科边界的形塑过程或许是相反的。只有明确地划分出何者为“近代”,我们才能将“近代”以前的历史归入“古代”的范畴。不仅如此,由于既往对“近代”的认知多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的前提上,因此“近代”往往成为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隐而不彰的“目的地”。无论是关于社会形态或时代分期的论争,还是近年仍多有学者引述或批驳的“唐宋变革论”等,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大抵很难逃脱从“近代”逆推“古代”,并比较不同朝代“先进”要素的多寡来确定分期的思维模式,而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生与流行,无疑与近代史学学科形成中接受的各种进步主义观念有关。因此,尽管宏大的理论争鸣已经退潮,所留下来的遗产,从每一位研究者进入专业领域时便开始产生日用而不知的影响。

如果说近代史学的功绩是打破了传统以“循环与停滞”为标签的王朝史,建构起线性而进步的演变线索,随着对“普遍规律”“世界史基本法则”的质疑与批判,晚近成长起来的学人对历史发展线索的关怀早已被精致的专门研究所取代,时代分期论争沦为在通史或断代史讲授时才会被偶尔提及的“天宝旧事”。在此背景下,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回避理论思考与历史解释,这或是很多人批评研究“碎片化”的成因之一;其二则是将具体的研究置于习用的理论框架中,同时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假说之间需要填补的空隙,如中文世界“唐宋变革论”的流行便是一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流行的解释框架,虽多脱胎于既往的论争,又被有意无意地剥离了时代分期的色

<sup>①</sup> 目前所见唯一对“中古”有明确限断的是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国中古史研究》,其发刊词云本刊所断自上秦汉统一,下迄唐宋变革期的元丰改革。事实上“中古”一词由学界的俗称至登堂入室,成为学术会议、刊物及论著中习见的名称,大约近十余年来才蔚成风潮,较早无论是机构还是刊物论著,如武汉大学三到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研究》等,皆习惯以更明确的时间或朝代冠名。学者虽不乏对“中古”一词的源流加以梳理者,如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第147—157页),谢伟杰《何谓“中古”?——“中古”一词及其指涉时段在中国史学中的模塑》(《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19页),但这种知识性清理的价值在于溯源,并不能纾解学者日常对中古一词“用而不释”的尴尬。

<sup>②</sup> 对分期的关注,并不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而是近代史学的共同特征,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学者最早撰述的通史,公认的创新便是改以上古、中古、近古划分中国历史。

彩<sup>①</sup>,如近来学人多有欲区分唐宋间“变化”与“变革”者<sup>②</sup>。事实上,若仅谈“变化”与“变革”之别,涉及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难免陷入言人人殊的困局。在早年时代分期论争的语境中,“变革”指代的是唐宋间社会形态的巨变,若承认历史有分期,变革无疑是题中之义,反之,唐宋变革论便成了无源之水,因为“变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无时无处不在。这种从既往统摄性框架中截取一二“中层理论”加以发挥的现象,反映出当下研究者面临的困窘,一方面我们已经抛弃了宏大的时代分期叙事,同时也无力(或者说回避)构拟出新的历史演进线索,或尝试论证某一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不甘心退回传统的王朝史。同时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当下,客观上存在将自己的实证研究置于某一理论关照之下的需求,——“理论饥渴”也是四十年来史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sup>③</sup>。理论上的进退维谷与具体研究的深入热闹相偕行,使得近年来中古史研究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是在一座旧的大厦上不断进行局部的翻新与装修,当然这种现象未必为中古史所独有。

如果说时代分期论构拟了超越王朝之上的发展线索与研究单元,近代史学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形塑了专门史。除了文史分途这类新旧转换外,对学者约束更大的可能是史学内部的分科,即我们日常学习与研究中从属的门类,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等。有些研究类别或可说古已有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些旧的门类,古今学者在研究范畴、方法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亦存在着根本不同<sup>④</sup>。有些门类,如近来广受瞩目的性别史、日常生活史、海洋史等,则属现代人从自身社会的问题与经验出发,对过去加以追问的产物。近代以降,随着理论与潮流的变化,专史的门类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同时也间接塑造着不同“专史”间的先后及升降。

以在大陆中古史领域中最强韧的研究传统制度史为例,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近代以来的几个变化。其一,研究范畴的伸缩。陈寅恪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涵括礼制、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个方面,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取资的范围与之类似,而目前作为专门史的制度史一般多指政治制度,以官制为主,其他部分则多被其他专门史所吸收<sup>⑤</sup>。若做进一步细究,陈寅恪所论的制度,虽然囊括甚广,所涉并不出传统史学典章制度的范围,以有明文记载的制度为限,而近来学者提出“活的制度史”,注意发掘制度运行中的默契、惯例等非条文的部分,也有溢出陈寅恪之处<sup>⑥</sup>。其次,学术传统的

① 类似的例子如学者多喜谈唐长孺“南朝化”之说,而较少提及“魏晋封建论”,事实上“南朝化”是作为解说“魏晋封建论”的一环而提出,参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综论”第484—501页。

②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一文曾对学界混淆“变革”与“转变”、“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期”等概念提出批评(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包括近来多有学者谈两宋变革、宋元变革等话题者,这些众说纷纭意见的产生,或与抛弃分期谈变革有关。

③ 并不是说近年来的中古史研究是“去理论化”的,而是思考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是破除既往宏大叙事,强调不是什么,但多少有意回避正面论说是什么,其二则是从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接引理论资源,与本土的经验相结合,建构中层理论或寻找新的研究门类与视角。

④ 侯旭东最近梳理了制度这一概念近代以来的变化(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除此之外,从传统的“食货”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可能经历了更大的转变,由于分科的关系,分置于经济学下“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⑤ 传统学术中的某一旧门类如果不能被某一专门史吸纳,则面临着萎缩的危险,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首篇为礼制,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对应的学科,很长时间内研究几近停滞。

⑥ 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其中关节却涉及何谓“制度”,传统典章制度指的是成文法条,而受新制度主义影响,近年学者倾向把日常生活起到规范作用的非成文规定也纳入制度的范畴。对制度概念的不同界定,也会引发学者对制度的运作是否有效的分歧,如张静与孙立平在研究农村基层社会时产生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便与此有关,参读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39—285页;陈胤:《制度概念的歧义与后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91—97页。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民族史领域。“民族”这一概念的传播与定型本身就是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与政治因素纠葛在一起,民国学者所谈的民族多有重心落在“种族”者,建国后则接受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的论述,近来学者又多借用“族群”这一概念。可以说在同一专门史领域中,早期研究者重视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现代学者更强调基于政治或文化认同的“群”,对“民族”内涵的不同认识,也造就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的转变。简要的梳理参读胡鸿:《能夏则大与新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

建构与各“专史”间地位的升降。钱穆《师友杂忆》中曾提及一则轶事,他1930年代想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因属“旧史学”,遭主事者反对而未果<sup>①</sup>。在近代新史学的浪潮中,作为帝王将相历史的一部分,传统“十通”之类的学问遭到排挤自不足为奇,然而制度史又如何从被摒弃的“旧史学”,重新成为金字塔尖的学问,这一学科内部演化脉络不但仍欠梳理,而且与近代以来很多被目为“传统”的东西一样,未必久远且时常变易。其三,学科条块划分的影响。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因院系及学科的重新规划与调整,显得尤为明显,学者日常参与学术活动中对此不难有切身的观察。如果某一专门史因建制的关系,被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中,出身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即使探讨类似的问题,研究的角度、诠释的模式乃至对材料的认识运用等方面都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如法律尽管也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但新中国成立后主体被纳入法学学科名下,既往法律系出身治法史者多喜欢将唐律与罗马法相比较,近来则多论及中国古代民法之有无,史学出身者则少有这种关怀。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无疑与学者身处的学科及在学科内部建构研究的合法性有关。这种“和而不同”甚至“不和不同”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宗教史、经济史等领域中<sup>②</sup>。

如果说断代史与专门史在外围筑起了边界,一旦进入学科内部,则普遍面临着“创新”的焦虑。我们虽然抛弃了线性的进步主义史观,转而却用“理论进步主义”填补其中。无可否认,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从西方引入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方面经过四十年来知识的累积,可以说已基本弥补了与西方史学的“代差”,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与议题,很快都有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中予以引介尝试;另一方面,理论的不断翻新似乎并没有缓解中国史学“理论饥渴”的病症。新史料与新方法作为学界最常标举的两个旗号,前者根植于史学内部,后者往往假借自社会科学,外生的理论工具与史学研究之间的张力,一直挥之不去。同时我们或稍可反思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拜,近代以来位居中国史学潮流中心的无疑是“新”,在各种论述中大体上都或隐或现地认为“新”约等同于“好”。时至今日,新史料与新方法依旧是最常见的会议主题,带有“新”这一帽子的刊物、论著更不计其数。除了新之外,学界似乎很少认真地探讨过,何谓好的史学研究。或许大家都能公认,任一史学论著若能兼备以下两项长处,便足以堪称优秀:一是通过对新史料的发掘或旧史料的重新解读,廓清既往晦暗不明的史实;二是借助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对某一历史事实作出了新的诠释。不过兼备两者之长的研究终是少数,假设仅能偏向一隅,我们是应该提倡史料取向的工作,还是更强调方法论的更新,每个学者恐怕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也反映了自身的研究偏好。不管如何,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日后学术研究的进步恐怕并非单靠“新”便能驱动。

本文有意回避了对具体研究得失的评判,只是希望提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研究的时间单元与学科并非自然的产物,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往往被奉为天经地义,隐而不彰地宰制着研究者知识与行为的边界。事实上,较之于在远处作为思想的学术史与作为知识的研究史,学者自身从属的学科及学术传统的形成、变易,乃至重新发现或接续,无论是主观选择还是被动纳入,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研究者个体有更深刻而隐微的影响,这也是学界内部“代际差异”的成因之一。任何人都不能真正自外于潮流,而是自知或不自知地被缠绕其中。若我们对身处的潮流有所思考,知其源、观其澜、察其不足,或许能成为走向真正意义上“重绘”的第一步。

<sup>①</sup>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9—170页。

<sup>②</sup> 宗教史是近年来中古史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刘屹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及宗教史研究中史料运用与学术规范的问题,在规范问题表象背后,实质或是不同学科对于何为“规范”认知的差异。这种学科间的“视差”从陈寅恪为冯友兰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便可窥见端倪,只是后来的学科分割更固化了这种分途。同样,与礼制史的情况类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巨大影响的民间信仰,由于不是制度性的宗教,很长时间内在宗教学中地位尴尬。

# 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 ——分类与边界

永田拓治

(日本阪南大学准教授)

### 序言:分类与界线

当人们思考某种事物的时候,作为思考的线索,首先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以各种各样的基准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对此,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曾说:“是在分类之前思考?还是在思考之前分类?我们所思考的是应该如何分类?打算分类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sup>①</sup>分类就是将没有归类的事物进行划分的工作。那么,原本没有被归类的事物应该如何分类呢?

例如,在图书的四部分类中有“史”部,这个分类被认为诞生于魏晋时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在汉代所没有的“史”的意识在魏晋时期诞生出来,并产生了史部吗?抑或是在“史”部分类发生后孕育出了“史”的意识?这个疑问很有可能引发如果没有“史”书就不会存在“史”部;或者如果不存在“史”部,就不会有“史”书等争论。

另一方面,一旦进行分类,就会产生界线,此乃理所当然之事。只是这种界线并不是任何人眼中都十分清晰明确的线。由于是在前人未涉的领域中进行划线分割,其界线往往不是明确的线,而是模糊的区域。而且对这种模糊的分界区域的理解有时也会因人而异。尽管如此,当涉及“界线”一词时,人们往往会认为“界线”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之间有可能发生偏离。因为在分类之前,在该区域并不存在界线。

界线通过分类而被明确化。在分类之前,被区分的双方在无意识中被认为属于同类。也就是说,分类原本是一种在没有明确界线的地方做划线的工作,这条线与其说是明确区分两者的一条分割线,倒不如认为它是连接两者而且包含可变动范围的一个区域。因此,本文使用“界线区域(境界领域)”这个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上所述,界线有时包含一定的可变动范围。

加上,本文中使用的“界线”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含义。例如,相邻两个王朝的边境,狭义上指对立的政权之间的边界地带。虽然到了形势紧张的时期,这里将成为两国政权对峙的攻防线,但是在两国政权关系稳定的时期,这里则是人和物资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从广义上看,狭义界线区域的存在会对当时人们的意识产生影响,包括因此产生的意识上的界线区域。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正是在这个狭义界限区域与广义界线区域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

### 一、历史研究框架变更——“魏晋南北朝史”的分类和界线区域

提到历史研究的分类,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属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哪一段。在这里笔者试举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学说为例:在日本的《史学杂志》的《回顾与展望》中,中国历史被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共七个时间轴<sup>②</sup>。

<sup>①</sup> ジョルジュ・ペレック:《考える/分類する:日常生活の社会学》,阪上脩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sup>②</sup> 魏晋南北朝隋唐在1961年的《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71-5)中开始成为一个时间轴。

当然,这一分类也不是绝对的。岸本美绪在《地区论·时代区分论》中方,针对时代区分论和地区区分论指出:“至20世纪末,(关于历史时代划分的争论中)进化出了不以既成实体框架为前提,而是根据历史学者的课题意识而设定的可变且多样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sup>①</sup>正如岸本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中古史这一分类,其边界也是具有可动范围的界线区域。

由于近三十年中发现了大量的新的出土资料,作为中国中古历史一部分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积累了很多新的知识和见解。而另一方面,研究对象逐渐细化,各领域的研究手法开始具有某种专业性。即使同样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他们之间也出现了学术上沟通困难的情况。甚至可以感到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研究对象分类在同一个时代的必然性变得越来越小。

在1976年的《史学杂志·回顾与展望》中,安田二郎指出:“六朝史研究中学者们面对的研究中的むつかしさ(困难),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六朝史研究的成果,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必须克服这种むつかしさ。因此,理解和分析学者们的方法和其理解历史的思想是不可缺少且有实际效果的。”首先在深入了解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其理解历史的思想后,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分类,也许就是我们克服“むつかしさ(困难)”的第一步。但是,从那时起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此间积累了更多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富化,我们应该如何对魏晋南北朝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呢?现在,分类分析这一视角出现了波动。

作为一种尝试,这里列举《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中对近十年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行的分类: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小尾孝夫	冈田和一郎	户川贵行	安部聡一郎	津田资久	藤井律之	堀内淳一	三浦雄城	北村一仁	梶山智史
总论	总说	贵族制	三国	政治史	西魏/北周史	政治	政治	序言	单著
政治制度	出土史料	王权论	贵族制和东晋南朝	贵族制	政治史	贵族	制度	学界动向	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
社会	政治	国家论	洛阳都城研究	弘农杨氏研究	官僚制	爵制	社会	广阔视野下的研究	政治
礼制	制度	中国史的相对化	北朝国家论	礼制	法制	外交	思想	都城	制度
城市空间	社会	史料批判	史料	官爵制度	经济	军事	宗教	环境	社会
历史地理	都城	出土资料	曹操墓	民众史	军事	思想	文学	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	思想
东亚	国际关系		墓志	出土史料	贵族/郡望	宗教	简牍史料	政治	文化
出土史料	民族		镇墓瓶	考古	地理	文学	石刻史料	制度	美术
石刻关系	宗教		画像	东亚地区国际关系	文学/学术	出土史料	其他	经济	考古
美术	美术		铜镜	史料	思想/宗教	文献史料		社会	展望
译注	文化		出土简牍	译注	民族	其他		思想	
索引	文学				考古			宗教	
	译注				图像资料			文学	
	索引				石刻			史料论	
					简牍			出土文物	
					敦煌/吐鲁番写本			考古	
					都城				
					六镇				
					史料辑佚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集:《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世界史像の再構成》,东京:绩文堂出版社,2017年,第3页。

由上可知,近年来《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中该内容的分类,每年各不相同,分法多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将经济独立地作为一个分类的现象只出现了两次。由28名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史的现在》<sup>①</sup>中,其内容分为“政治人物”“思想·文化”“国都·都城”“出土资料”四个分类。在“总论”中,编者窪添庆文指出:过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的主要课题“社会经济史”,在该书中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这个现象与《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魏晋南北朝史中的分类是共同的。这种现象表明:当深入研究某段历史的特质之时,对其研究对象的分类也是存在变动的。

## 二、分析视角的多样化——可见的界线区域与意识上的界线区域

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分裂时代,其王朝之间是存在着界线的。在划分这种界线时,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正是在这种界线的分割下才产生了所谓“南北方”及“南北方士人”之不同。

如果在此重提界线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说在世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界线。这种界线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见界线,另一种是不可见界线。所谓可见界线,可举出自然环境的划分、王朝之间的划分、行政划分等例子。不可见界线,是因可见的界线的存在而产生出的各种意识上的界线。意识上的界线,可以经叙述成为可见界线(因叙述而产生的划分/学术上的分类、民族、身份等)。由于可见界线和不可见界线的相互作用,界线可以成为对社会进行定义的力量,比如南北人意识或地区优劣意识等等。

在这里再次回看分类的本质,可以说是在原本就没有划分的地方设置“应该划分”的界线。在这种界线上,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有割裂,而且可以看到连接性的历史作用,并可能对其进行分析。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界线是这种分裂现象的一个指标,笔者很想利用这种方法从界线中找到该时代的共通性。

在迄今为止正史性的历史叙述文体中,已经形成了王朝史架构下的南朝—北朝型叙事构造。使用界线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克服上述王朝史架构下的历史叙述乃至历史认识的不足。已经被细分化的该时代的历史研究中,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找到具有共通性的新的理论框架。

基于这一想法,笔者在《史学杂志》(128-5,2019年)《2018年的回顾和展望 魏晋南北朝》中作了如下分类:

- 1.具有多样研究视角的研究。
- 2.注目于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的各种界线中的连接性侧面,探寻历史特质的研究。
  - (1)着眼于可见界线的研究;
  - (2)着眼于意识上(不可见的)界线的研究。
- 3.属于长期性展望的研究。

## 结 语

笔者一直以汉晋期(后汉三国西晋东晋期)这个时间轴为中心对历史展开研究。现在主要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分类方法,是否能明确中国中古史的历史特质呢?基于这个疑问,笔者有了重新对以前的分类进行验证的想法。

魏晋南北朝时代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王朝之间的区分是其这个分裂时代的前提。虽然可见界线已经为大家所认识,但这种界线有很多是十分模糊的。如《南史》《北史》等史书的叙述中似乎明确划分了分割南北的界线。因此笔者在小稿中,打算从“连接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个象征分裂

<sup>①</sup> 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东京:勉诚出版,2017年。

的南北分界线,发现两朝历史的共同点,并在共同点中找到独特性。另外,笔者以为需要关注可见界线区域和不可见界线区域的相互作用,即笔者的关注会不仅仅停留于可见界线发生作用以及不可见界线的形成过程。由于不可见界线的叙述会逐渐产生的新的可见界线,于是会有一个界线的再生产过程。这种界线意识的再生产也是笔者计划研究的课题。笔者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找出魏晋南北朝史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性以及叙述的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重要的界线区域之一,本篇小文是为寻找对该时代重新验证的线索而作的。

##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可能性

胡 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中华崩坏与扩大”、五胡北族占据华北、南方山区加速开发的时代,各类族群现象是其最为耀眼的主题之一。从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前辈大家以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或多或少会涉及到族群问题,相关成果也蔚为大观,而专门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如马长寿、周伟洲、内田吟风等,也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留下了厚重的专著。那么在未来,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还有哪些可能性?对于总体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可能在哪些方面继续作出独特的贡献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只是尝试提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答案。

中古前期民族史研究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首先是资料条件。较之先秦秦汉时期的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资料更为丰富。纪传体王朝史中专列的夷狄传在此时期日渐完备,直至发展成为体例完整的“四夷传”。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来自北方边疆的五胡诸族建立了王朝,因而像《十六国春秋》(部分保存于《晋书·载记》)乃至北朝四史都成了民族史性质浓厚的史料。这是此前时代不曾有的新现象。而且这些文献是得到北族统治者首肯的官方正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北族的主体性表达。更可贵的是,同时期的南方诸王朝的“正史”中还保留着用异族传体例为北方政权撰写的传记,即《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等,将两种文本进行对比,很多问题便能浮现出来。在传世文献以外,简牍、石刻、纸本文书等出土史料数量也非常可观,尤其以墓志、碑刻、造像记等石刻史料为大宗,如马长寿的名作《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是大批量运用这类史料进行民族史研究的典范<sup>①</sup>,学界对这类新史料的重视至今长盛不衰。与唐以后的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的史料文字和语言是单一的,只有中文,基本是汉语,——虽然包含一些音译的非汉语词汇。这既是缺陷,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之下,也是有利的研究条件,毕竟研究的门槛降低了不少。总之,资料不多不少,不少则不至于只依靠只言片语的孤证来猜测,不多则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时可以做到史料的穷尽占有,而语言理解的障碍几乎不存在。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特性。魏晋南北朝时代“去古未远”,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般都要溯及秦汉,这两个时期加起来,就是大部分非华夏族群拥有较可信文献记载的开始了。而这些被记载的人与事,则凭借经学或史学文献的权威成为后代历史记忆的源头。民族史研究特别重视“起源”,因此对于早期阶段史实的深入认识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很多谬误和迷思需要在此理清。另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族群现象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以政治体形态而论,4—6世纪的中国北方,原居于帝国边境地带的诸族纷纷进入中原,有些建立国家称帝称王,有些还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态,汉晋

<sup>①</sup>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以来的华夏官制与内亚草原上袭用已久的各类名号杂糅共用,政治体和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异常明显。更有些政权,如北魏,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从较为简单低级的草原政治体向复杂官僚制帝国的转型,其他一些政权如前秦、慕容五燕等也在此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还有一些小的政治体尚未完成演进,就被更大的政治体吞并而卷入后者的发展道路之中。这些政权共同在历史舞台上构成一个绚烂的光谱,犹如将从部落到帝国的政治体演进过程并列地展示出来,将各种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列出供我们分析比较。主导中国历史后半段的北族王朝(或称“征服王朝”),在中古前期的十六国北朝时代已经小规模地预演了一遍。魏特夫将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称为“渗透王朝”,它们与后来的“征服王朝”是否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很值得重新考虑。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拥有这些优势,同时也有很深厚的积累,如何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是最令人迷惑和焦虑的问题。借着笔谈的机会,试将近年来管见所及的一些有潜力的研究路径和方向梳理如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反思既有理论和宏大叙事,回到史实,将民族史的问题从几组大而化之的宏观理论如“胡化汉化”“民族融合”“起源与迁徙”等等之中解放出来。如何才能做到?立足理论本身的反思是一方面,比如思考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民族”,能否套用经典的“民族”理论去理解那时的人群分类和认同等。如王明珂的系列著作,在解构实体论“民族”概念、提倡认同研究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sup>①</sup>。另一方面,发扬中古史领域精细解读史料、善于从小中见大的传统,走向细节,贴近史实,应该也是一个途径。不再满足于总体上印证某个既有理论命题,而是充分挖掘其过程和细节,尽可能还原出有血有肉有人的“活”历史,而这样很可能对既有的理论提出挑战。21世纪以来,已颇有学者在这一方向上探索出具有典范性的成果。如田余庆运用中古政治史的精细考证方法,通过对北魏的两种“制度”即“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进行政治史的过程性解读,细致呈现了代北时期拓跋部从依靠联姻、结盟而形成的不稳定政治体走向君主专制的中原式王朝的演进过程<sup>②</sup>。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斗争与探索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华夏制度文化,也不是一个被某种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又如侯旭东重新梳理了北魏的胡族管理政策,指出兼容部落组织存在的护军制和镇戍制一直与郡县制并行交织,强调了部落解散和编户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sup>③</sup>。这一研究提示了国家和制度在族群塑造中的作用,也展现了在“族群化”或“去族群化”的进程中各方存在激烈的政治博弈。对既有宏大叙事的挑战还可举出一例:民族史中尤为重视“起源”问题,而1980年代嘎仙洞北魏祭文石刻的发现,曾让拓跋鲜卑获得了中古诸民族中最为确定的“起源”。罗新通过仔细分析这一石洞在北魏时期的“发现”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北魏太武帝将此石窟草率认定为“先世旧墟”,不过是配合东北亚新局势的一次心照不宣的文化表演,进而指出“起源与迁徙,是传统民族史史料最突出的两大陷阱”,这类统治集团主导的历史记忆掩盖了人群中大多数的真正源流,是应该被历史研究反思和解构的对象<sup>④</sup>。

第二,放下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发掘被中文史学书写所掩盖的各族群文化的特殊之处。在研究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这一方法显得尤其突出。从华夏化的汉字史学书写中识别出北族传统的元素,在20世纪已成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方法之一<sup>⑤</sup>。世纪之交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发现和复原<sup>⑥</sup>,尤其是对其碑阴题名的解读,令一个与《魏书》所记大相径庭的拓跋魏集团浮现出来,为此种路径的研究注入了新动力。进入21世纪之后,2007年出版的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力图站在北族的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 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③ 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幽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④ 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辑。

⑤ 20世纪末的代表性著作有: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乡出版社,1995年)和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⑥ 张庆捷、李彪:《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

角度去理解北朝史,对领民酋长与部落解散,《南巡碑》为中心的石刻史料所见的内朝官、迁都洛阳、石刻与史籍中的代人集团等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揭示出了北魏早期国家体制中融会北族传统与魏晋制度而形成的诸面向,并以北族集团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主动性贯穿始终<sup>①</sup>。近年黄楨从文明太后去世后孝文帝为臣僚制定的服丧方案中解读出北魏官制中的圈层划分,再将它回溯到孝文帝之前的北魏历史中,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华夏官制的以内外圈层为特征的北族式官制结构,从而对包括《南巡碑》题名在内的许多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sup>②</sup>,这在松下宪一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佐川英治考察了北魏平城的鹿苑,揭示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附属于宫城的苑囿,而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牧场,从游牧世界获得的牲畜被集中于此,再通过计口授田投放到农耕世界,鹿苑实为游牧与农耕之间的资源转换器,于北魏前期的国力积累关系重大<sup>③</sup>。这些都是此种路径下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

然而以鲜卑为首的北族毕竟有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仅从汉字资料和汉语文献进行批判性还原仍有很大局限,有时需要向其他时代的民族史、域外文明史汲取灵感甚至史料,才能补全中古时代的残缺拼图。在就北朝论北朝越来越艰难时,罗新通过吸收阿尔泰语系历史语言学的成果,对中古时期中文史料中的部分音译专名进行还原和归类,不仅找出它们的“语源”,更据此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官号+官称”的名号结构,进而讨论名号中显示的北族政治体演进历程<sup>④</sup>。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突厥、回鹘、蒙古等拥有自身文字记载和现代语言传承的古代语言,上述研究则充分展现了十六国北朝名号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可以在从匈奴至蒙古时期的草原文化中找到共通性。此后,罗新进一步提出“内亚性”概念,倡导“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其《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一书通过论证北魏皇帝黑氈上即位礼仪的诸多元素出现于突厥、回鹘、契丹、黑海北岸的可萨人、草原帝国时期的蒙古以及15—16世纪统治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后裔中,明确地将“内亚性”作为一个概念和方法提出<sup>⑤</sup>。“内亚性”强调内亚传统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将中古时期的北方民族史从时间上与辽金元清相联系,从空间上与整个中央欧亚地域相贯通,使得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以与“世界史”中的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研究对话。内亚不只是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文明,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只是内亚之一角,很多现象必须要到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看得完整。“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成为北朝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不断涌现出引人注意的尝试,如魏斌借助后世史料中的“地方记忆”,论证了山西中北部几个高山、亚高山草甸地区比如宁武天池在南匈奴以来的北族传统中的重要性<sup>⑥</sup>。刘莹将北魏七月七日的讲武活动比定为拓跋鲜卑的“秋祭”,并认为它是一种长久流传的草原文化传统,也是巩固部落联盟关系的重要手段<sup>⑦</sup>。孙正军考察了北朝隋唐独有的“宗子军”的性质和演变,并将它与内亚传统中对拟制血缘的重视联系起来<sup>⑧</sup>。事实上,“内亚性”的内涵——尤其是在较早的时代——并不是已经被透彻了解的,仅仅依靠正史中《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等简略记载远远不够解明,还有待于从中文史料间接的、变形的、隐晦的记载中去还原。内亚世界的重心在东部,也就是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而在8世纪之前,关于这里几乎只有中文史料的记载,由此可知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族特色文化与社会的还原,不仅要借助已

①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

② 黄楨:《北魏前期的官制结构——侍臣、内职与外臣》,《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佐川英治:《游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7号,2007年。中译文《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136页。

④ 罗新:《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罗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⑥ 魏斌:《地方传说中的北魏皇帝——区域脉络与历史情境》,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8年。

⑦ 刘莹:《北魏讲武考——草原传统与华夏礼仪之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⑧ 孙正军:《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知的“内亚性”，还能扩充对“内亚性”内涵的认识。

第三，在南方族群的研究中寻找突破。北方的研究精彩纷呈，相比之下，南方诸族的关注热度就要少很多。中古南方的山岭湖海间活跃着被冠以蛮、越、蛮、獠等名称的各类人群，与北方民族史的波澜壮阔相比，南方的族群问题显得波澜不惊。然而从秦汉到唐末五代，南方的政区设置、族群结构、经济开发程度、人口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北方。这一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在经典民族理论的语境下，对南方诸族的族源、族属分化和迁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等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主观认同论、边缘理论等的引入，此前那些将越、蛮、獠等理所当然地各自视为“民族”或“族群”实体，再去追寻其源流、分布、迁徙、文化特性，或者作为民族实体与国家政权之互动的研究思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一些新的思考角度随之出现。如鲁西奇反思了当前通行的以“共同文化”或“族群性”界定的“蛮”概念，证明了他们在文化面貌上极为多样，唯一的共性是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脱籍”是其共同特征，与其将他们看作血缘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不如视为“社会群体”或“地域居民集团”<sup>①</sup>。在后来对滨海地域水上人群的研究中，鲁西奇同样重视他们游走于国家版籍控制系统边缘的性质，将他们视为地域性居民集团，而基本未讨论其族属或族源等<sup>②</sup>。罗新则强调山越、蛮等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不能简单视为一族，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与华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他将进入华夏政治体系——往往以编户化为完成标志——称为“霑沐王化”，这是一个国家主导的政治过程，而山地蛮夷也在王化与山险之间不断做着艰难的抉择，但接受王化并不能等于文化上的同化<sup>③</sup>。在此基础上，胡鸿用“华夏网络”描述华夏国家在南方统治的空间结构，从网络对山地的“圈隔”、网络断裂带的华夷实力对比局部逆转以及山地政治体的成长等方面，对中古南方山地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示了山地诸族群政治上的主动性与政治文化上的被动性并存的境地<sup>④</sup>。在新史料挖掘方面，魏斌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等简牍材料中姓氏、人名的分析，钩沉了这类姓、名结构与汉晋间南方土著人群编户化进程的关系，并进一步论及南方族群接受华夏文化时的区域特征和阶层差异<sup>⑤</sup>。魏斌的另一篇论文从古人堤简牍中数行文字的考证出发，揭示了东汉在武陵蛮地区的屯营体系和统治形态，并进一步论述了蛮人在国家势力进入之后的种落分化<sup>⑥</sup>。这一系列研究，展现了简牍等新史料在南方族群研究中的巨大潜能。类似于“内亚性”，南方山区应该也有超越具体朝代而长时段存在的某种文化连续性，也有着与中原华夏文化不同的原生土著文化，虽然其内部的一体性不及北方草原。若能致力于发现此种原生文化，以及它接触华夏文化之后发展出新的混合文化的过程，多少可以触及到一点“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sup>⑦</sup>。

经过以上非常不全面的梳理，或许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未来的“可能性”，首先在于突破“民族史”，不为既有的民族理论所束缚；其次在于突破“魏晋南北朝”，视野必须超越断代史的格局；最后则是视角的转换：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庙堂走向民众，从集团转向个体，从结构转向过程。

① 鲁西奇：《释“蛮”》，《文史》2008年第3辑。

② 鲁西奇：《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④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二章、第五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⑤ 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8年，第23—45页。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⑥ 魏斌：《古人堤简牍与东汉武陵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1分，2014年。

⑦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货币经济的面向

吴承翰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

货币史在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中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相较于农业、土地、户口或力役、赋税等范畴,货币似乎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其理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农业官僚帝国,无论重农抑商是一种形式的表态还是真实的制约,围绕农业的主题自然处于社会经济史的核心。

不过,如果站在重绘中古史的角度来看,则货币史理应受到更多一点关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重绘,有时是因为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有时是因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但历史之所以需要不断被重绘,往往与书写者身处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如今,我们置身一个被货币包围的经济世界。无论实体还是虚拟,每个人从清醒到入眠,几乎总要透过货币,方能与社会发生连结。这样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想象一个“在这种状态以前”的世界?那样的世界又是按照何种机制与逻辑,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行?尽管货币在中国史上由来已久,可是当我们带着今天这个世界的经济常识去解读过往的经济世界时,难道不会因为习以为常的前提,作出偏离客观历史的诠释(假如真有一个“客观历史”的话)?如果货币在当时与现今一样十分重要,那么应该追问的是,何以在经济结构异质的基础上,货币却能发挥相似的作用?反之,假若货币在当时没那么重要,或是重要的形式与今日有所不同,我们就应抓住这个古今皆有、但意义不同的元素,作为重新反思社会经济史的利器。

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以来,即便是比较冷门的中古货币经济史,也累积了庞大的研究。因此我采取一种权宜的方法,根据论者对于货币性质的判断,进行粗略的分类。第一种分类称之为“市场性的货币论”。以全汉昇为代表,其中古自然经济说强调货币的形态会随着市场商业活动的发展程度而异,产生不同的变化。如汉末到中唐商业衰落,故以实物货币为主;中唐以后商业复兴,故金属货币地位抬升;至北宋更发达,遂有纸币出现。这种将货币性质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看法,并非全汉昇独有,毋宁说在货币史研究者中十分常见,只是全氏将此一看法与历史分期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第二种分类是“国家性的货币论”,以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足立启二、宫泽知之为代表。他们基于专制国家论与小经营生产方式论的共同理论,将货币视为国家整合社会的诸多重要手段之一。宫泽知之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货币与市场货币的概念区分,并指出铜钱的本质应属国家权力性质的财政货币,而非市场货币。简言之,这两种货币论的预设存在根本的差异。

从生成背景来看,两者皆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在全汉昇的时代,中国社会停滞论盛行。陶希圣反对此说,并提出独自的中国历史分期论(分前后二说,日本京都学派的分期与其后说相近)。全汉昇深受陶氏影响,因此他的中古自然经济说,必然要淡化何兹全抛出的南北差异的质疑,如此方能合理推衍出唐宋之间的货币经济复兴,而这正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证成中国社会发展未停滞的坚实理由。足立启二、宫泽知之成长的时代,则是世界史基本法则盛行的年代。在单线发展论依然浓厚的氛围中,他们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当代中国的由来,因而反对当时普遍以封建制概念诠释中国社会的方式,并在中村哲的理论启发下,建立专制国家论的模型,以区别于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类型。

尽管实质论点对立,但它们都深受论者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清晰的时代烙印。循此逻辑,时移势异以后,自然还会孕育新的动向。例如栢沼阳平,他重视新出土资料、并尝试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的特质,反映出一种后冷战世代的共同特征。于此,无论是激烈对立的意识型态也好、不可调和的历史分期也罢,皆已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构成核心议题。就此角度来

看,重绘中古史有时是人们主动刻意为之的结果,有时则是不断被时代重绘的人们自然酝酿的产物。

应补充的是,这两种货币论之间并非排他性地互斥。强调市场性的论者,同样也会关注国家财政的现象,只是他们多半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国家财政变迁的原因。反之,国家性论者也会讨论市场的问题,只是他们认为从市场流通到财政物流之间并非连续的因果关系,前者不必然导出后者。其次更应强调的是,这两种货币论并不存在先后交替取代的关系。当国家性货币论的观点出现后,采取市场性的论者依然坚守其说。当采取经济人类学或多元视角解析货币的观点出现后,市场性、国家性两派论者也依然持续在发展、完善各自的假说。由此导出第三点观察,即各种货币论之间,或许基于偶然或其他因素,彼此经常欠缺充分的对话,甚至可能缺乏应当进行对话的意识。这在研究者展开个别实证研究的课题时,也许问题不大。但是一旦涉及如何建立比较长时段的、宏观层次的历史架构时,除非我们有意回避忽视某一方的观点,否则彼此理论预设的矛盾,自然就会构成解释历史变迁时的理论难题。

这个理论难题成了我在构思如何重新诠释唐宋货币经济变迁时的原点。我并未直接研究两者的异同,而是将此难题作为问题意识,植入各项实证研究之中。为此,我做了一些唐宋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货币思想与议论的辨析,以及不同地域经济和货币性质的讨论,等等。这些看似分散的主题,最终都围绕并且收束在如何回答上述理论难题的焦点上。我尝试以一种“带有理论意义的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回答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题。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我的确从中看到一丝重绘中古史图景的可能性。

总之,货币史研究是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最有意思之处,莫过于在史料之中发现一些乍看符合现代常识,但细思不妥、又带有违和感的问题。例如,南北朝到唐宋之间相当盛行的短陌现象,即反映一种货币内在交换价值并非均质存在的特性。因其存续直至晚清,故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现阶段可知的是,倘若直接套用当代经济逻辑加以诠释,可能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然而正是这种思考的困境,引导我们仔细重读前辈的经典著作,反复探勘理论(暂定的假说)与史实(无论新旧)之间的无穷可能,从而拾起重绘中古经济史的乐趣。

[责任编辑 孙 齐]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An Answer from Jin Yuelin's Position**

Liu Xinwen

Wang Hao present a project when he evaluated Jin Yuelin's academic career, but it was not implemented. We will take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as the main line to try to carry out this plan. In 1927, Jin Yuelin attributed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ll-encompassing neorealist system of philosophy to logic, but encountered the "logocentric predicament" when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 logic. In his philosophical work during his later years, he continued his early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of logic, thinking that this problem was too big for the whole logic, thus focus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inference, and basing inference on "the possibility of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facts". We think that Jin Yuelin's thesis can be regarded as an answer to the foundational problem of logic if inference is the core of logic. This answer goes out of the trap he encountered in his early work,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the un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logic and history, but also embodie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aking philosophy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to directly serve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country" and "taking philosophy as a specialized study to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strive for a higher position for China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Three Stars in the Sky: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Geography and Legends of Xia Ruin**

Liu Zongdi

Fu Sinian divided the Huaxia world in ancient times into two group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which the group of Xia is one in the west living mainly in the area of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This theory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times as well as archaeology on Xia and Shang. And because of the discovery of large settlement sites belonged to Longshan Culture found in west of Henan, south of Shanxi, and north of Shaanxi, the opinion that Xia lived in the west almost becomes a consensus. One of the important evidences of the opinion is the record in the *Commentary of Zuo* that Shuyu, the earliest ancestor of the State of Jin, being enfeoffed the Xia ruin which is presumed as in Hedong, i.e. southwest Shanxi. However, by careful textual criticism of records in ancient books,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State of Tang was actually in west of Shandong, and it was Xie, Shuyu's son, who began to move to Hedong. In that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Fu Sinian's theory as well as archaeology of Xia rui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based on it.

**The Possibility of Redescription of Medieval History (Conversations by Writing)**

**Editor's Note:** The studies of medieval history ar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elds with the deepest accumulation, the most prominent achievements, and the most active young scholar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academic advancement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changed our cognition of the basic prospect on medieval history? Do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rearrange the basic clues of medieval history at present?...At the First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by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the 12th Young Scholar Association on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held in August 2019, the editorial office invited six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theme of "possibility of redescription of medieval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esearch or reflection. This group of articles are just part of achievements on the forum.

**Various Activities of Local Literati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10th Century:****Focused on Liu Kai Family**

Yan Jianfei

Liu Kai family was a typical local literati family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10th Century. Family members were civilians, military officials, or military officials changed from civilians. They were appoin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or Military Commissioner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hold their officials in six prefectures of Weibo.